

達賴集團的叛國活動評析

黃鴻釗*

一、達賴集團叛逃後的概況

在 1959 年西藏動亂發生之日起，達賴集團就預感其必然之失敗，並事先做好了叛逃的準備。他們採取分散逃跑的辦法。3 月 17 日下午，首先，達賴的親教師和 4 名噶廈躲在板車後面的帆布罩下，混出羅布林卡宮；傍晚，達賴的母親、他的弟弟天津秋結、姐姐澤仁多瑪經過喬裝打扮，以前往拉薩河南岸的尼庵為名溜出宮去。接下來，達賴向他的護法佛像拜祭禱告，獻上哈達。這是西藏傳統的告辭儀式，表示決心回來的意願。晚上 10 點鐘左右，達賴進行化裝，穿上一件黑色長大衣和一條長褲，右肩扛一枝步槍，脫下眼鏡，放進口袋，跟在侍衛總管去結堪布後面，以例行巡夜為名，趁着夜色摸索走出宮外，隨即南渡拉薩河，在河對岸與他的母親、弟弟、姐姐，以及親教師和幾名噶廈官員會合。此時達賴重新戴上眼鏡趕路，次日早上 8 時，達賴一行到達拉薩邊緣的切拉隘口(che-La 為多沙的隘口)。這時達賴的逃亡隊伍增至近 100 人，另有 350 名藏軍士兵和 50 名遊擊隊，擔負沿途護衛的任務。事實上，除了達賴，這支隊伍中都是全副武裝。其中至少有兩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一個就是達賴的私人廚師，另一個則隨身帶着一部發報機，一路上與其上級保持着極為密切的聯絡，聯絡內容甚至連達賴都不知道。這就充分說明，西藏叛亂是有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其間，並密切地監視着事件的進程。¹

逃亡途中，中央政府於 3 月 20 日命令解放軍駐藏部隊平息叛亂。達賴聞訊，對共產黨更加恨得要死，他避而不談叛軍包圍炮轟西藏軍區，以及叛亂分子首先開槍射擊，打死打傷解放軍多人的事實，卻大罵共產黨殘酷不仁，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群眾。一個星期後，達賴集團到達隆次宗(Lhuntse Dzong)，在

這裏停留兩天，召開千人大會，達賴在會上駁斥 17 條協議，宣佈成立西藏政府，並舉行就職儀式。² 這次會議表明，達賴已經毫無置疑地走上了公開叛國的道路。在此之前及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國內媒體沒有正視這一事實，而僅僅說達賴是被叛亂分子所挾持的，無非是給他留下一個台階，希望他有朝一日迷途知返，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但達賴卻是鐵了心要走分裂祖國的道路，並且以後還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工於心計的狡猾政客。

這樣，達賴集團於 3 月底安然無恙地抵達印度。而受叛亂事件影響，也有數以萬計西藏難民湧入印度。達賴出逃期間，曾派先行隊伍前往印度，請求收留。印度政府自然一口應承。當達賴集團到達印度邊境城市旁地拉(Bomtila)時，受到當地政府的歡迎。印度總理尼赫魯發來電報稱：

“我的同僚和我歡迎你，並致候你安全抵達印度。我們很高興能提供必要的設備給你、你的家族和隨員，以便安住在印度。對你保持極高敬意的印度人民毫無疑問地會依照傳統，給予閣下應有的尊重。

願慈悲關照你。

尼赫魯”³

達賴集團被安置在穆索里居住。這以後，據達賴自傳所說，在該年之內，尼赫魯至少 4 次同達賴見面。

第 1 次是在 4 月 24 日，尼赫魯親自來到穆索里看望達賴，兩人會談了足足 4 個小時。尼赫魯聽取了達賴關於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不承認 17 條協議、實行不流血鬥爭爭取西藏獨立等叛國分裂計劃。雖然尼赫魯表示不會承認西藏流亡政府，但表示對達賴叛亂集團充分同情和支持。

第 2 次是在 6 月間，達賴前往新德里拜訪尼赫魯，會商有關西藏難民問題。當時已有 2 萬名西藏難民湧入印度，而且數字還在不斷增長之中。尼赫魯聽

*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取了達賴的報告後，決定安排難民修建印度東北公路，以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又立即於當日宣佈成立西藏教育學會，研究實施西藏難民兒童的教育問題。達賴對此十分感激，他又認為，表達感激的最佳方式，就是立即進行反華活動，分裂祖國。達賴“覺得打破沉默的時機成熟了”，便於6月20日，在他的居住地舉行記者招待會，共有13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與會。會上，達賴“正式地再一次否認十七條協議”，控訴共產黨殘暴對待藏人的罪行。

9月2日，達賴又從穆索里前往新德里，第3次同尼赫魯會見。這次會見“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在聯合國提出西藏獨立權的問題”。⁴ 印度官方對這次會見做了精心的準備，特別給予達賴國家元首級的隆重接待，印度外交部副部長梅農夫人、人民社會黨主席辛哈、國大黨德里邦委員會主席古普塔，以及德里副市長隆尼等官方要員都到車站歡迎，場面十分熱烈。與此同時，又煽動起一股反華叫囂聲浪，在車站外聚集了一大群人，手持標語牌，口中呼叫口號：“中國劊子手滾出西藏去！”“打倒中國帝國主義！”“西藏自治是印度安全的保障。”隨後，達賴喇嘛下榻於印度政府高級迎賓館海得拉巴大廈。尼赫魯在會見達賴時，宣佈從南印度接近米索(Mysore)地區中，撥出3,000英畝土地安置西藏新難民；但是，對於達賴“提出在聯合國舉行西藏問題聽證會的計劃”尼赫魯表面上持保留態度，認為即使辦到了，效力也不大。不過實際上，他並不反對達賴這樣做。他說：“使西藏問題繼續凸顯下去，並不是靠聯合國，而是要靠對下一代的適當教育。但是這完全要看你自己。你生活在一個自由國度裏。”⁵ 尼赫魯會見達賴後，於9月10日發表關於對達賴叛亂集團政策的談話時，曾表示印度政府不贊成達賴把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的做法，並反覆強調達賴在印度的活動主要涉及宗教問題，而應盡可能避免熱衷於政治爭論。但又指出，達賴有權自由行動。人們不難看出，尼赫魯是在偽裝中間立場，以便逃避干涉中國內政的責任，實際上是極力縱容和慫恿達賴繼續進行分裂祖國、大搞西藏獨立運動。達賴還先後會見了總統普拉沙德、副總統克里希南、內政部長潘特、財政部長德賽，以及西藏後援委員會(Tibet Support Committee)主席納拉揚等政要，還有一些國家駐印度的大使。從他們那裏得到了別有用心同情和支持，使達賴感到打了一支強心劑。

12月間，達賴在他朝聖的旅程中再訪新德里，同尼赫魯進行了第4次會見。上次會晤之後，西藏問題引起普遍注意，國際上接連發生幾個大的動作：一是

10月間，由馬來西亞和愛爾蘭在聯合國提出了西藏問題提案，經過大會辯論後，以45票贊成、9票反對、26票棄權，而獲得通過。其中，印度是棄權國家之一。二是亞非國家會議在新德里召開，專門討論了西藏問題，表示支持達賴集團。三是1959年底，美國率先成立了兩個組織：由阿屠梨庫立帕拉尼領導的中央救濟委員會(Central Relief Committee)和美國西藏難民急難委員會(American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ibetan Refugees)，這些是一系列支援西藏叛亂集團的有關組織之開端。對於叛亂後短時間內便取得這些成就，達賴本人感到無比得意，特地去向尼赫魯匯報情況。尼赫魯也興高采烈地向達賴道喜。從此，達賴對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政府充滿感恩戴德之情，他後來在撰寫自傳時，甚至說：

“只有印度才有權利來援助我們。因為佛教是從印度傳到西藏，此外伴隨佛教傳入，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文化影響。因此我心中毫無疑問地認為印度比中國聲稱領有西藏主權。中國對西藏只有些微的影響力。”⁶

事實上，這是印度政府籠絡達賴叛亂集團政策的勝利。不久，印度政府把達賴的永久居住地安排在達蘭莎拉，比起穆索里來，該處距新德里更遠一些。但那裏的自然環境極佳，水比穆索里的牛奶還好。1960年4月29日，達賴一行從穆索里搬遷到達蘭莎拉。在那裏住下來之後，達賴為了此後從事政治活動的需要，開始學習英語，並研究宗教。與此同時，又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着手進行一些行政與經濟上改革，加強反華基地的建設。

第一，簡化禮儀。達賴在西藏一向被人為地神化，住居布達拉宮中，凡人百姓輕易見不到，而能見到他的人，也要行跪拜禮儀，不可抬頭仰視，不得平起平坐。流亡印度後，徹底地喪失了在拉薩布達拉宮的那種優越條件，而從事反華政治活動，又使他時刻都要接觸人，發表談話、處理事務。情勢逼迫他放棄許多繁瑣禮儀，要求部屬和藏人不行大禮，他本人不坐高位，與母親和管家共住一屋。他聲稱，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使自己成為凡人。此刻的達賴，從政治活動的需要出發，很在意與外界人士和難民加強聯繫，樹立自身的開明形象，以擴大其影響力。這說明，他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宗教領袖，而是一個標準的流亡政客了。

第二，改革行政機構。1959年6-8月間，達賴在流亡政府中增設情報、教育、重建、安全、宗教事務和經濟事務等辦公室。還有意識地在其叛亂政府中安

排一些女性擔任要職。1960年整整一年間，達賴繼續致力於西藏政制民主化。同年9月2日，成立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又稱西藏人民代表大會)，這是流亡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作用與國會相同。代表由西藏烏昌、安多與康省三地經自由選舉產生，西藏佛教的主要教派，以及古老的苯教信徒，也同樣擁有議席。該委員會的成員每月要同噶廈及各部門主管開會一次。改革之後，噶廈成員已不是由達賴指定，而是從選舉產生。人民代表投票通過的事項，有關部門必須依照決議執行。1961年叛亂政府擬訂了一個西藏憲法草案，其中有一條規定：只要國民大會代表中有 2/3 的票數通過，就可解除達賴喇嘛的職權。

第三，保存與延續宗教。達賴畢竟意識到，如果喪失了宗教，藏民的文化源泉就會乾枯，就會失去叛亂集團以及其追隨者的凝聚力。因此在安排難民居住與勞動的同時，又在印度政府資助下，利用不丹邊境附近的布哈杜爾戰俘營舊址，成立一個僧人學術社區，最初資助名額為 300 名，其後增至 1,500 名，他們是由 6,000 名流亡僧人中選拔出來的。後來，達賴在其住處附近建造南嘉寺院，並在這所寺院旁邊成立一所佛教辯論學院(School of Buddhist Dialectics)，還建造了一所春拉康(Tsuglakhang)的新寺院。於是達賴便使用這些寺院舉行各種宗教儀式。後來又在南方卡納塔卡省重建甘丹、哲蚌和色拉三大寺，安置流亡的僧人。到 20 世紀 90 年代，寺院已安置了 6,000 名以上的流亡僧人。

第四，投資經營企業。到 1960 年，流亡印度的難民達 10 萬人，印度政府除了安排這些人築路之外，就是建立了 20 個屯墾區，予以安置，使得難民基本上解決了生活問題。但這只是在從事粗重勞動的情況下，才得以艱難地生存。對此，達賴集團是不能滿足的。達賴便籌劃興辦企業，發展經濟，企圖用賺來的錢解決流亡政府的部分反華活動經費。早在 1950 年，達賴的弟弟天津秋結就偷運一批西藏寶物存於錫金，以便叛亂時使用。此刻達賴便將這些寶物在加爾各答進行拍賣，得款 800 萬美元。使用這筆錢興辦了一家鋼鐵工廠、一家紙廠，以及其他一些事業，但由於經管人員營私舞弊，大飽私囊，發生嚴重虧損，最後只剩下不到 100 萬美元了。於是 1964 年用這些錢成立了達賴喇嘛慈善信託基金。

二、達賴蛻變為反華政治代表

西藏之所以變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問題，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的。19 世紀末，首先是由英國人發動了兩次侵略西藏戰爭，奪取了種種特權，並使西藏變成他的勢力範圍。與此同時，俄國也圖謀侵藏，與英國展開激烈爭奪。二戰以後，美國、印度等國家也帶着各自的動機，加入了爭奪的行列。這些國家的共同目標，就是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以打擊和削弱中國。然後再使西藏變成惟命是聽的附屬國。

達賴集團叛逃國外後，也積極參與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陰謀，極力推進西藏問題的國際化。他在 1959 年 9 月 2 日同尼赫魯會見時，提出要把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並且說，他明知不會有甚麼效果，但仍表示：“我這麼做只是想讓世人記得西藏。不讓世人忘記西藏人的悲慘遭遇是非常重要的。”⁷ 讓國際知道西藏，目的是尋求國際上支持西藏獨立，這是達賴集團一個長期性的、策略性的行動綱領。20 世紀 60 年代的國際化活動，主要是聯絡鄰近的亞洲地區國家。這些國家很多是信奉佛教的，因此，達賴主要以宗教性的訪問，運用宗教領袖身份傳經說教，介紹西藏文化，引起世人的注意和重視，博取同情和支持。

與此同時，達賴集團極力發動各種暴力行動騷擾西藏邊境，煽動藏人在西藏製造破壞和動亂，企圖通過這種內外夾擊，迫使中共在西藏問題上做出讓步。這樣在西藏地區便不時有一些搗亂事件發生。但是達賴集團人力物力有限，收容達賴的印度也並非富國，更何況當時它的領導人尼赫魯抱有一種矛盾的心態，他既利用達賴集團反華，以便乘機使印度勢力擴張於西藏，但又不願為了支持達賴集團而同中國徹底決裂，始終對支持達賴採取大規模反華有所顧忌。在這種情況下，達賴集團主要靠某些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給予一些零星支援，財力有限。因此這些小騷亂並沒有造成多大影響，這真正是所謂“幾條泥鰍掀不起大浪！”

達賴叛逃印度之時，儘管信誓旦旦，夢想有朝一日要以獨立國統治者的身份返回西藏，但究竟何年何月可以得逞，他是沒有把握的。因此達賴集團提倡教育問題，很注意向年輕的藏人灌輸叛國分裂思想。當然，其教材內容無非是歪曲歷史事實，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家，並且隨心所欲地將中國 1/4 的領土勾勒為西藏領土，灌輸他們亡國之悲戚，以催動其復國之情懷。力圖使這些藏族同胞成為反對祖國、

分裂祖國的工具，在達賴集團別有用心的教唆之下，加深了海外藏族同胞的對立情緒。

從 70 年代開始，達賴又把視線擴展到亞洲以外地區。首先，他有計劃地使一部分難民離開印度，到海外建立新的屯墾社區。在美國和加拿大，各有 600 人，瑞士有 2,000 人，英國有 100 人，其他歐洲國家大約各有數十人。隨着這種新的移民屯墾計劃的展開，達賴集團也分別在加德滿都、紐約、蘇黎世、東京、倫敦和華盛頓等地，設立了幾個海外辦事處，借照顧當地藏民福利為名，進行鼓吹西藏獨立的政治活動。1973 年達賴接連訪問了歐洲 11 個國家。特別是 1979 年訪問美國和俄國等重要大國，使其宣傳西藏問題一時甚囂塵上。

進入 80 年代，達賴關於西藏問題的國際活動，是圍繞着所謂“西藏人權”問題展開的。顯然，此舉與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美國總統卡特提出了“人權外交”有關。達賴主動配合美國外交政策，把人權問題同西藏問題掛鉤，使得西藏問題除了宗教之外，又增加了一個符合西方國家價值觀念的東西，從而企求博得西方更多的同情和支持。達賴主動地把西藏問題去迎合帝國主義政策的需要，甘心情願地充當國際反華勢力的工具。同時，80 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巨大成效，包括西藏地區也推行了寬鬆政策，中國的國際形象有了明顯改變，西方各國政府從現實利益出發，對中國的態度也比較友善，不願在西藏問題上開罪中國，危及本身貿易利益。關於西藏獨立的那一套宣傳受到冷淡，達賴出訪也不順利。於是達賴改變策略，將宣傳對象改為各國議會，繼續保持了宣傳的勢頭。真是用心良苦。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中國政府表示希望流亡海外的達賴及其追隨者返回家園，共同建設新西藏。並先後邀請達賴派了 3 個代表團回西藏觀光考察，但是這些代表團回來的目的，竟似乎不是為了推進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而主要是收集資料，惡意攻擊中國蹂躪人權。據達賴自傳稱：

“不幸地，他們(代表團)對新西藏的印象非常不好。不管他們到那裏都被淚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圍，他們也看到充足的證據，顯示中共當局以殘忍而有系統的方式，企圖摧毀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們也見證到無以計數的饑荒歲月，許許多多人餓死、遭到公開處決，諸如此類對人權形成顯著而可怕的侵犯。最輕微的則是誘拐兒童，有些小孩被驅迫為奴工，有的則送往中國受‘教育’；以及監禁無辜的公民，無數僧尼死於集中營裏。許多照片生動地說明這真是個可怕

的末世景象：寺院、尼庵只剩下斷垣殘壁，或是變成了穀倉、工廠、牛欄。”⁸

達賴別有用心地把西藏描述成非常淒慘的人間地獄，把中共政權說成是無惡不作的土匪集團。他利用中國政府的善意邀請，發動猛烈的攻擊。其矛頭不僅對着中共，而且是對着中國人民，對着整個中華民族，他這樣極力迎合國際反華勢力的惡意宣傳，正好表明他沒有絲毫誠意解決他返回西藏的問題。

但雙方的接觸仍在繼續。1982 年 4 月初，達賴派出 3 人代表前往北京談判西藏前途問題。首席代表是流亡噶廈官員竹謙圖滇南結，另一個是達賴侍衛總管吞措塔希塔克拉，還有流亡西藏人民大會主席羅提結稱結瑞。會談中，中國政府表示真誠歡迎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回國，達賴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可以仍按照 1959 年以前相同。但西藏代表則聲稱，西藏自古是一個獨立國家，建議中共根據這些事實，對西藏採取新的方針。雙方南轅北轍，走不到一起來。儘管談判沒有進展，但中國政府仍邀請達賴回國訪問。

在此期間，達賴頻頻出訪，尋求外援。他於 1979、1981 和 1984 年三次訪美，三番幾次叩求美國政客能為西藏做點事。經過反覆多次活動，結果在 1985 年 7 月，糾合了 91 名美國國會議員聯名寫信給國家主席李先念，表示希望中國政府在同西藏談判中，“盡可能考慮達賴喇嘛閣下及其人民極為合理而正當的願望。”⁹ 達賴本人為成功地爭取到美國國會某些人支持西藏獨立而興高采烈。然而，美國國會干涉中國內政的企圖遭到中國政府的反對，未能得逞。接着，達賴等人經過了一番密謀策劃，又由美國國會人權會議出面邀請，達賴於 1987 年 9 月 21 日，在美國國會發表西藏人權演講。他在抨擊了中國政府無視西藏人權之後，便拋出了“五點和平計劃”：¹⁰

1. 使整個西藏變為和平地區

達賴認為，所謂整個西藏，就是把包括西藏自治區，以及東部的西康(昌都地區)和安多省(青海藏區)，變成一個阿希母薩區(Ahimsa 是個印度教名詞，意思是和平與非暴力狀態)。他聲稱，西藏歷來是亞洲大陸大國之間的緩衝。要建立這樣一個西藏和平區，中國就得將其軍隊和軍事設施從這個“國家”撤走。歷史上中國和印度的關係從來沒有緊張過，只是在中國軍隊開進西藏，這兩個國家要劃定邊界之後，關係才緊張起來，以致導致了 1962 年的戰爭。如果用一個友好、遼闊的緩衝區把兩國隔離開來，將會大大有利於促進世界上這兩個人口數一數二的國家恢復友好關係。

2. 中國放棄向西藏地區移植人口政策，因為這威脅着西藏民族的生存

達賴攻擊中國政府違反 1949 年的第 4 個日內瓦公約，讓大批中國平民遷居西藏，給藏族的生存構成威脅。據他說，今天，在整個藏區，遷居去的中國人已達 750 萬人，而藏族人口只有 600 萬人。在西藏自治區，藏族人只有 190 萬，在該地區居民中已佔少數，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中國駐紮在藏區的 30-50 萬軍隊。他在這個假設的前提下提出：為了使藏族作為一個民族生存下去，必須制止人口遷居，必須讓在藏定居的中國人返回中國。否則，藏區很快就會變成只不過是一個吸引遊客的遊覽勝地，一個曾有過一段輝煌歷史的遺跡。

3. 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民主權利

達賴聲稱：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中國人在那裏推行一種稱為分離和同化的種族隔離政策，對藏民實行歧視，藏民在自己的國家裏，充其量只是二等居民。他們在一個殖民政府的統治下生活，被剝奪了一切基本權利和自由。

4. 恢復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放棄在西藏生產核武器和堆放核廢料計劃

達賴攻擊中國破壞西藏的生態環境。他說，從前，西藏是一個有獨特自然環境的沒有受破壞的野生天然保護區。令人傷心的是，在過去的數十年裏，西藏的野生動物和森林幾乎被中國人破壞殆盡，這給西藏優美環境造成了破壞性影響。西藏剩下的那點東西必須加以保護，必須努力使環境恢復平衡狀態。中國在西藏生產核武器，可能還開始在西藏傾倒核廢料。這樣做所帶來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對西藏的獨一無二的優美環境漠不關心，這不僅使現在活着的幾代人受到威脅，而且會給今後的幾代人造成威脅。

5. 對西藏地位及中藏人民的關係立即展開談判

達賴進行了上面那一番猛烈的抨擊之後，又假惺惺地表示，希望本着坦率與和解的精神，通情達理和實事求是地處理這個問題，着眼點應該是努力尋找一種符合藏人、中國人和其他所有有關民族長遠利益的解決辦法。藏人和漢人都是獨特的民族，但是，這不一定妨礙兩個民族在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方面進行真正的合作。

達賴的所謂“五點和平計劃”，實際上是一份鼓吹“西藏獨立”的宣言書。1951 年，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十七條協議，和平解放西藏。到 1959 年，達賴集團少數人撕毀協議，發動叛亂，出逃外國。所謂西藏問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然而，這

少數人的出走，並沒有影響西藏社會的發展進程。40 年後，西藏社會面貌煥然一新。但中國政府對達賴集團仍然不咎既往，以博大胸懷，歡迎他們返回西藏參加建設。可是，達賴的回應卻是：“你向我搖動橄欖枝，我卻對你重拳出擊”。無論甚麼人，看了達賴的“計劃”，便會知道達賴根本不是在談和平，而是要繼續進行對抗。達賴本人也知道，中國政府絕不會接受他的計劃。他之所以提出這個計劃，目的也不在乎中國政府是否接受，而是為了宣傳。早在 100 年前，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瓜分中國，曾經大肆宣傳“黃禍論”。如今，西方國家和日本的某些反華勢力也在叫嚷：中國的強大會對別的國家造成威脅，因而千方百計削弱和分裂中國。達賴不僅極力鼓吹西藏獨立，而且還主張把新疆變成獨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國家。他的這種分裂中國的言論十分符合西方列強的胃口，因此在西方大受歡迎，他本人也就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寵兒。

美國國會某些人立即對達賴演講做出回應。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佩爾和參議員赫爾姆斯表示支持達賴。他們向國會提出了一個所謂“西藏問題修正案”，要求美國政府將對華外交與人權問題聯繫起來，里根政府在國會提出向中國出售武器之請求時，要能“判定中國真有誠意地、及時地着手解決西藏的人權問題”。還呼籲里根會見達賴，建議美國向流亡印度的 10 萬藏民提供 20 萬美元的援助。

為了與達賴鼓吹西藏獨立的演講相呼應，叛亂集團又在西藏內部策動騷亂，企圖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1987 年 9 月 27 日，拉薩八角街發生示威遊行，要求西藏獨立。但這次事件很快就平息了。

接着，達賴又轉到歐洲進行反華活動。1988 年 6 月 15 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大廈，達賴舉行記者招待會。會上，他把原有的“五點和平計劃”又作了一番精妙的政治包裝，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七點建議”：

1. 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國保持“聯盟”關係。
2. 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是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辦事處。
3. 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權宣言。
4. 由全民投票選舉出西藏政府的執行首腦，對財政立法，以及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政府的所在地設在拉薩。
5. 西藏的經濟、社會制度應該根據西藏人民的意願來決定。

6. 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他武器的製造、試驗、儲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7. 召開一個地區性和平會議，以便保證使西藏通過非軍事化而成為和平的聖地，在這個會議召開和非軍事化、非核化實現之前，中國可以有權在西藏保持以防禦為目的的、有限量的軍事設施的存在。

達賴這次拋出的“七點建議”，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公開宣佈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如果說，前面提出五點和平計劃時，達賴仍表示要同中國政府談判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那麼，這一次達賴則代之以通過國際會議來保證西藏的地位。這可以說是達賴宣傳攻勢的高峰。他終於亮出了底牌：將中國的領土提交某個“國際會議”來審議。達賴說出了西方列強非常想說而說不出口的話，因此，國際反華勢力對於他的贊許又加深了一層。

此外，同上次一樣，叛亂分子又在西藏策動騷亂，與達賴反華行動相呼應。1989年3月5日，拉薩再次發生抗議示威，迫使中共於3月7日宣佈戒嚴。達賴在評說這些騷亂時，毫不掩飾他對西藏動亂的讚許之情，他說：“我雖然決不寬容暴力，但我承認某些程度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我甚至對我的同胞的勇氣深感敬佩。”¹¹

1989年是國際和國內形勢大動盪的一年。國內發生天安門六四事件，國際則有東歐諸國政權易手、德國統一、前蘇聯局勢動盪等等。在這種動盪形勢下，達賴所做的反華表演顯得尤其突出，他在國際上就所謂西藏問題興風作浪，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整個中華民族發動猖狂的攻擊，博得了西方國家的讚賞和喝彩。為此，西方國家甚至決定授予達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示公開支持達賴搞西藏獨立，他們在達賴身上投下了大賭注，企圖通過這一舉動，能夠在西藏問題上掀起更大的反華浪潮。

果然，達賴集團為了回報西方國家的獎勵，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立即開展西藏問題新一輪的宣傳攻勢。

首先，流亡組織宣佈1991年為“國際西藏年”（從1991年3月至1992年3月）。這一年，達賴再度頻頻出訪歐美國家，並在許多國家舉辦“西藏展覽”和藏戲演出，召開國際性藏學討論會，等等。叛亂集團的活動空間和內容都有了明顯的增加，其影響也有所擴大。特別是美國總統布希公然不顧西方大國領袖向來不接見達賴的慣例，於3月底與達賴會晤。英國首相梅傑也於同年12月與達賴見面。他們這樣做，顯然是出於支持達賴搞西藏獨立，為達賴鼓勁打氣，

以達到分裂中國的罪惡目的。

由於鼓吹西藏獨立備受國際反華勢力的讚揚和獎賞，達賴等人利令智昏，頭腦發熱，調子隨之不斷升高，往年達賴提出“五點計劃”和“七點建議”時，雖已明顯有要求獨立之實，卻仍然羞羞答答，極力避免使用“獨立”這個詞。現在他認為形勢有利，再也無須顧忌甚麼了。於是公開打出了西藏獨立的旗幟。1991年達賴在南印度班格魯為國際佛學研究中心舉行奠基典禮，會見記者時，達賴表示，他將繼續為“西藏獨立”而奮鬥。1992年4月26日，達賴為了討好印度政府，慷慨表態將中國領土拱手相讓。他在印度接受報界訪問時，公開表示承認“麥克馬洪綫”。聲稱，這是西藏以“獨立國家”的地位，同英國在“西姆拉會議”上簽訂的“國界”。同年11月16日，他在印度德拉敦接受記者訪問時，又公然表示，印度同意西藏為中國統治下的一個“自治區”是錯誤的政策，“西藏獨立”指日可待。

但達賴等人高興得太早了，形勢並沒有如同達賴所期望的那樣，朝着有利於“藏獨”的方向發展。1992年以後中國重新啟動市場經濟，市場轉好，商機湧現，國際形象大為改觀。1993年西方大國為了搶奪中國市場，紛紛調整對華政策，取消經濟制裁，全面恢復同中國的正常對話。這些國家同中國改善關係以後，對西藏流亡組織的宣傳不再那麼感興趣了。達賴等人在世界各處興高采烈地喊叫了一番之後，也發現他們離開與中國政府對話，侈談“西藏獨立”，只不過是癡心妄想。於是，達賴採取了以退為進的手法，退回到呼籲舉行談判。他在1993年5月的倫敦記者會上說：“中共將大量漢人移入西藏，將會有意或無意地造成漢族文化滅絕藏族文化的後果。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藏族有決定自己事務的權利，西藏流亡組織願意比照中共對待香港和台灣的模式，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展開談判”。¹² 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你既然認為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雙方又為何在“一國兩制”下展開談判呢？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大概達賴也覺得不妥。因此不久之後，他在同德國外長見面時說，“不堅持西藏獨立，只追求真正自治”。1993年6月間，又在加拿大參加留學生座談會時表示，“不論未來西藏是否獨立，希望西藏成為一個和平區”。

1994年以後，國際上民族主義高漲，英國的北愛爾蘭、印尼的東帝汶、加拿大的魁北克都採取了公民投票方式來解決獨立的合法性問題。達賴再次抓住國際的政治動向，在宣傳上又玩弄了一個新花樣，大肆

宣傳西藏問題由“公民投票”決定。同時，達賴還積極與台灣的“台獨”勢力、海外的“民運”分子聯絡，企圖建立一個統一戰綫來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其中最突出的是魏京生與達賴集團的同流合污。

魏京生到美國後，立即在某些人的牽綫搭橋之下，與達賴集團掛上了鉤，建立起反共同盟。1998年1月4日，魏京生發表長篇反共談話時，公開美化西藏農奴制，支持西藏獨立。他宣稱，農奴制在西藏是一種好制度，甚麼剝人皮呀、用人頭骨做用具呀都不是殘暴行為，“農奴往往是世襲的，其實有些窮人，流浪漢甚麼的，他想當農奴人家還不收他呢。當了農奴他就有飯吃了，不用操心了。”¹³ 他並且說，如果說農奴制不好，正是共產黨進入西藏以後擴大了農奴制。他說：“而事實上很重要的一點是，從40年代開始，西藏地方政府就已經在進行改革了。逐漸釋放農奴，逐漸擴大自由民身份，包括社會上一些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他已經在進行了，而且速度並不慢。這個改革被50年代共產黨的進駐完全打斷了，改了半天又回去了。西藏很多老百姓都說，本來我們都不是農奴，現在倒變得跟農奴一樣了。”魏京生聲稱共產黨在西藏搞大屠殺，製造無人區，因此對達賴集團完全支持。事實上魏京生並沒有去過西藏，他所說的一切資料來自達賴集團。魏京生公開支持“藏獨”立場，鼓吹分裂中國的言論，在海外引起軒然大波。因為現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無論任何派別，凡是涉及國家主權問題，總是抱有“金甌無缺”的態度，堅持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例如清朝皇帝和孫中山，蔣介石和共產黨等十分尖銳對立的雙方，都是一致主張維護西藏主權。因此魏京生鼓吹西藏獨立的謬論，立即在海外遭到普遍的反對，海外民運分子中也有不少人痛斥魏京生是賣國賊。

三、達賴集團的反華活動必然失敗

綜觀達賴集團叛逃印度50年來的反華活動，由於同國際反華勢力相勾結，經常發動宣傳攻勢，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達賴本人更備受西方大國賞識，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達賴所策謀的“西藏獨立”運動，除了在國際上產生了某些宣傳效應之外，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它的失敗。

達賴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所倡導的“西藏獨立”是一種反歷史的行動。達賴說，直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西藏之前，西藏一向是個獨立國家。這

是別有用心的捏造。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1300多年以前，漢藏兩族就開始友好交往。800年以前，西藏納入中國版圖。從此，西藏便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藏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元朝一直至解放前為止，中國政府都在用不同方式管治西藏，這是不容改變的客觀事實。最先侵略西藏的英國政府，至遲到1903年，外交大臣發給印度總督的信中，就曾明確指出，西藏確實是中國的一個省。¹⁴ 當然英國並不因此放棄侵略。1904年英國發動侵藏戰爭後，曾先後逼迫中國政府簽訂中英藏印條約和續約，並要求由中國政府為西藏賠款。這都是英國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明證。辛亥革命後，英國趁中國局勢動盪之機，長期策動西藏獨立，破壞藏族同胞與祖國的關係，幹了許多壞事。然而，西藏始終沒有從中國分裂出去，變成一個獨立國家，它依然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達賴偏說西藏是個國家，除了他自己，在國際上誰也不相信，不支持。就連跟他們關係最密切的印度等國家也是如此。尼赫魯就明確地反對西藏獨立，不承認達賴的“流亡政府”，就因為它不符合歷史事實。

因此達賴大罵中國是外來征服者、殖民者，是沒有根據的。而他公開稱印度更有資格擁有西藏主權，則進一步暴露出其賣國求榮的罪惡嘴臉。

達賴搞西藏獨立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倒退。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又稱“十七條協議”。根據這個協議，西藏人民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奴役，獲得和平解放，中國的統一、民族的團結，這是歷史的進步。達賴撕毀十七條和平協議，發動叛亂，妄圖恢復舊制度，這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結果被西藏人民唾棄，被歷史所唾棄，成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其次，達賴缺乏實現其復辟計劃的必要的社會基礎和力量。40年來，達賴鼓吹西藏獨立不遺餘力，而且制定了憲法，成立了流亡政府，自任這個“政府”的首腦，他自稱是西藏的主宰者。但這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癡人說夢而已。他們這一夥人本身是窮途末路的亡命之徒，如今寄人籬下，沒有控制着一寸的西藏領土，有甚麼資格稱自己是西藏的主人呢？

達賴認為西藏人支持他。誠然，藏民在信仰方面，對宗教的領袖有一種崇敬之情。這是達賴最為得意的資本。然而，借助藏人支持重新復辟，其實並不可能。因為宗教上的崇拜是一回事，物質利益又是另一回事。

達賴說，當今藏人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西藏充

滿危機。只有達賴才能解救西藏人民，只有恢復封建農奴制才是出路。但這是虛構出來的。事實上，西藏欣欣向榮，並沒有危機。誠然，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曾產生過很大危害，西藏社會無疑也受到波及。但經過撥亂反正之後，又重新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西藏人民生活比流落印度的逃亡者好得多，因此並不希望這些封建貴族領主返回西藏，重新騎在他們頭上。

達賴要求解放軍和漢人全部撤離西藏。這真是異想天開，根本辦不到的。解放軍在西藏擔負着維護西藏的領土主權，以及保衛邊疆的重任，豈能撤離？漢人進入西藏參加建設，對西藏社會經濟的發展，貢獻極大。在歷史上，中華民族內部的融合是必然趨勢，是一種進步現象，如果把漢人趕跑，西藏重新處於與世隔絕和孤立狀態，將是歷史的倒退。達賴想扭轉歷史車輪，是行不通的。

達賴挾洋自重，跑了許多國家乞求援助，利用國際反華勢力向中國政府施壓，妄圖使中國政府屈服，接受達賴的獨立要求。西方大國確實相當重視達賴的作用，給予不少的資助，讓他周遊列國，進行反華宣傳，以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中國局勢的不穩定，延緩中國的發展和強大。但他們並不願意公開支持西藏獨立，而同中國翻臉。因為他們深知達賴既沒有理由，也沒有實力分裂中國。所以對於達賴來說，西方大國也不可靠，幫不了達賴的忙。

最後，達賴分裂活動的前景不妙。

1. 國際形勢發生不利於達賴的因素。配合國際形勢進行反華活動，是達賴集團的一大特點。他善於抓住國際潮流中的問題，同西藏掛起鉤來宣傳。西方人講民主，達賴也高唱民主；西方人講人權，達賴也以人權攻擊中國政府；西方人講反對核擴散，達賴立即提出西藏為非核區，中國不得在西藏儲存核廢料；西方講不使用武力，達賴立即提出將西藏建立為和平區；西方人講公民投票，達賴立即端出西藏公民投票方案。總之，達賴非常巧妙地結合國際形勢宣傳西藏問題，儘管這些問題都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謬論，但卻頗能使人困惑，又迎合西方反華勢力的需要，深得西方媒體的歡心，成為風頭一時的人物。

然而曾幾何時，國際風雲突變，又使達賴集團的宣傳活動陷入困境。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和平外交政策也大有進展。尤其是1997-1998年中美兩國首腦的互訪，以及這兩個大國宣佈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對達賴集團震動巨大。因為達賴一夥的政治賭注，是押在西方國家同中國關係緊張上面的。這種關係愈緊張，達賴的活動

空間愈大，也愈能迷惑輿論。相反，這種關係緩和了，美國等西方大國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以及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支持西藏獨立，達賴的宣傳就難以得逞了。

1998年5月間，印度為了建立南亞霸權，率先進行核試驗，巴基斯坦不甘落後也進行核試驗，使得南亞局勢頓時緊張。這時正在美國訪問的達賴公然發表談話為印度辯護。他“呼籲已開發國家不應對印度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指手划腳”，“某些國家可以發展核武器，卻限制其他國家不能發展，怎麼說都不算民主。”這些言行與其以往反對中國核試驗，宣佈西藏應該成為無核區等是矛盾的，充分暴露了達賴這個所謂和平戰士的真面目。使他處境十分尷尬。

2. 達賴開始對反華宣傳喪失信心。達賴從逃離西藏之日起，就下定決心復辟失去的農奴主的天堂，把政治賭注押在分裂中國上面。他的言行不僅反對共產黨，而且反對中華民族。他對中國人的極度敵視，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叛徒。當他領了諾貝爾和平獎後，寫了自傳表明心跡，徹底地賣身投靠西方，誓與中國周旋到底。

但是經過幾十年分裂活動之後，他不得不承認失敗的現實。自稱他這一代是無法回到西藏了，寄希望於第二代和第三代。不過如果這一代回不了西藏，長期居留海外，就會變成海外藏胞僑民。可是達賴對此置之不顧。他的使命是掀起西藏獨立的宣傳運動，從中撈取名利，他確實得到了。至於目的能否實現，藏人能否回到西藏，他可不管。這是對流亡海外的藏族同胞極不負責的態度。

其實，中國政府始終敞開談判大門，1998年克林頓訪華時，江澤民主席指出：只要達賴公開表示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談判就可以立即進行。可是達賴的表態卻是：在2000年3月10日，由他的大哥當才宣佈成立“藏人爭取獨立世界委員會”，簡稱“藏獨同盟”。其目標是：①恢復西藏獨立；②爭取達賴作為自由、民主、主權國家的國家元首回到西藏；③在達賴1963年頒佈的憲法草案、法制、佛教人道普遍原則、以及世界文明哲學的基礎上，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西藏國。委員會的口號是：不要出賣自由；不要購買中國貨。¹⁵

進入新世紀以來，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更加猖狂。他們公然以“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自居，與中央政府進行接觸，聲稱“不尋求獨立、只尋求自治”，給人一種不斷放低身段，對中央妥協的印象。在接觸商談過程中，又大肆散佈“藏中對話”、“藏漢談判”的言論，企圖造成他們是境內外全體藏族人民代

表的印象，藉以迷惑藏區的幹部群眾，爭取國際輿論同情。

與此同時，又竭力把分裂活動引入境內。實施所謂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即在法律法規允許的範圍內搞“藏獨”活動，通過秘密串聯，躲在幕後煽動和操縱群眾，以消極抵抗的方式向黨和政府示威，逃避政府處理。同時加緊依靠西方勢力向中央施壓。2007年10月，達賴竄訪美國，美國“高調”授予達賴“國會金獎”，德國、奧地利、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政要也紛紛公開“高調”會見達賴，掀起了一股支持達賴集團的“惡流”。

另一方面，則由“藏青會”等“主獨派”進行暴力恐怖活動。早在2003年7月3日，達賴集團下屬的“藏青會”主席格桑平措就叫囂：“達賴喇嘛多次宣稱決不訴諸暴力，而只要是為了我們的事業，我們是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的，無論是暴力還是非暴力。我們計劃對我們成員進行為期六個月的遊擊戰訓練。”2008年北京奧運會來臨前夕，達賴集團的分裂破壞活動明顯增多。1月4日，“藏青會”等達賴集團五個激進組織，通過互聯網發出起所謂的“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組織策劃境外藏人“挺進西藏”，叫囂“不惜流血和犧牲生命也要恢復‘西藏獨立’！”“藏青會”還通過各種渠道與境內聯繫，頻繁向境內發佈指令，煽動群眾“行動起來”。3月10日“藏青會”等5個激進組織在印度達蘭薩拉正式發起“挺進西藏”活動，引發了西藏拉薩和其他藏區“3·14”嚴重的打砸搶燒犯罪事件。這一暴力犯罪事件充分暴

露了達賴集團一貫標榜的“非暴力”、“不追求獨立”、“和平對話”等花言巧語，全都是一派謊言。

“3·14”暴力犯罪事件遭到全球華人華僑留學生一致譴責之後，特別是達賴集團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火炬在各國傳遞的行徑遭到華人華僑留學生的強烈抗議之後，達賴感到形勢不妙，為了挽回不良影響，於是，達賴集團頻繁與海外動亂分子謀面，鼓動他們同“藏獨”分子一起共同成立“漢藏友好協會”。一些海外動亂分子撰寫文章《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獨立：西藏人民的夢想》，炮製所謂“中華聯邦憲法草案”，為西藏、新疆從中國“獨立”出去設計“理論”依據。

2011年以來，中國藏區發生多起自焚事件，一些年輕僧侶因此喪生。對此，達賴集團不但不加批評、勸阻，反而大加頌揚，稱自焚“偉大而光榮”，是“非暴力鬥爭的最高形式”，將自焚者稱為“英雄”、“鬥士”。更有甚者，達賴集團公然在互聯網上發表“自焚指導書”，變本加厲地煽動境內藏人“按計劃和步驟實施自焚”。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反人類的極端方式，也與佛法教義相違背。在藏傳佛教歷史上，通過自焚這種極不人道的的方式來表達某種政治訴求，是沒有先例的。然而煽動、教唆、脅迫僧人自焚，只不過是達賴集團在分裂主義活動屢遭挫敗、前景黯淡的情況下，黔驢技窮，不得已而為之的垂死掙扎。

綜上所述，半個世紀以來，達賴始終堅持分裂中國的反動立場，走上不歸之路。可以預料，他和他的追隨者的下場必然是十分可悲的。

註釋：

- ¹ Dalai Lama：《達賴喇嘛自傳》，康鼎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第161-165頁。
- ² 同上註，第166頁。
- ³ 同上註，第169-170頁。
- ⁴ 同上註，第180頁。
- ⁵ 同上註，第181頁。
- ⁶ 同上註，第176頁。
- ⁷ 同上註，第181頁。
- ⁸ 同上註，第277頁。
- ⁹ 同上註，第294頁。
- ¹⁰ 同上註，第295-300頁。
- ¹¹ 同上註，第311頁。
- ¹² 楊開煌：《達賴喇嘛“西藏問題”國際化之策略分析》，台北：蒙藏委員會，1999年，第11頁。

- ¹³ 《魏京生訪談錄》，載於《華夏文摘》，第140期增刊，1998年1月12日出版。
- ¹⁴ 《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第185頁。黃鴻釗：《英俄在西藏的爭奪——外交外交選譯》，載於《近代史資料》，1982年第2期，第21頁。
- ¹⁵ 據世界西藏網2000年3月10日報道。